

陈德森 我为电影痴迷忧愁

文 张一然

印象

亲历港片黄金年代 满腔大爱回报社会

香港自由行开通后，“跟着港片游香港”一度成了热门游玩线路。旺角、庙街、铜锣湾、尖沙咀、半山扶梯……香港虽不大，香港的导演们却能一直让这些景观在影片里摇曳生姿。这是一种真爱，就像陈德森导演经常会在朋友圈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：“这个家……真的很美！”

陈德森的人生亦很美。他说：“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，便是社会给我拍戏赚钱的机会，而我又能回馈社会。”他的奕奕神采，他的眉梢笑颜，皆缘于他在行善传爱。

以前过生日，朋友们送红酒、雪茄、威士忌。问他喜欢吗？他笑说当然喜欢。而近年来，他开始在自己生日的前后回报社会，邀请100位独居老人欢聚，“100人加起来有七八千岁了，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，是我自己收获的那种快乐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”春节则是另一番吉祥景象，他联合一众好友为独居老人送礼物、发红包。六十多岁的他在诸多老人身边，俨然一个“青春小哥哥”。这也是他最舒心的时刻。

浸淫电影行业50年，陈德森是港片“黄金年代”的参与者与见证者。近日，他出版了《把悲伤留给电影》一书，向观众讲述自己电影人生的苦与乐，想唤起大家向善、孝老、求实、省身的正能量。构思这本书时，他回想当年：为什么那么想进电影圈，大概是年少时为了逃避家庭及父亲；入行后拼命往前奔，也是为了证明给父亲看。但当自己的事业渐入佳境，父亲却去世了，不得不说是他最大的遗憾。他想借着此书告诉大家：“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能孝老就多孝顺一点，千万别像我！”

同时，这本书的所有收入都将捐献给大凉山儿童之家。前一阵子，他重登大凉山，山路陡峭，难挡他志，天气恶劣，难阻他心。车的后备厢塞满了他带给孩子们的礼物，一路开进平均海拔2000米的美姑县儿童之家。他去探食堂、看教室、做家访……在漫山的野花中，陈德森找到了一条行善之路。他拜托笔者在文章中“一定要写一写大凉山的孩子们，期待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们，能够为他们伸出援手”。

陈德森

1958年出生，香港导演，主要电影作品《晚9朝5》《神偷谍影》《童梦奇缘》《十月围城》《一个人的武林》《征途》等。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、中国电影华表奖。

我18岁，跟着他的日子天天都吃好喝好，他待我犹如亲弟弟，投资人为了推荐自家剧本更是对我亲近有加。那会儿就一个字，“飘”。但我始终记得自己是来学做导演的。21岁那年，我吞吞吐吐地对大哥如实相告。大哥没说话，但他的表情好像在说“就凭你”？虽然他有些不快，但还是推荐我到一部戏中去做场记，后来我拍《特务迷城》时，他又主动来我做男主角。

现实生活中受到的讥讽 往往会成为电影里的台词

问：听说您年轻时跟过很多导演，但也因此被人讥笑？

陈德森：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副导演的，那时候有点像师徒制，一部电影成功了，导演或监制便会提拔长期跟在自己身边的后辈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大家往往会专心为同一个导演或监制长期工作。可能我比较缺乏耐心，又比较好学，没有只跟一个剧组或导演，总希望能汲取更多不同导演的风格和经验。我跟过的导演有章国明、泰迪罗宾、黄志强、程小东、徐克等。几年过去，我仍是副导演，但身边不少电影工作者朋友都已经由副导演变成了导演。

问：那您觉得失落吗？

陈德森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聚会，一名

18岁给成龙当助理
但始终不忘导演梦

问：您最早喜欢上电影是什么时候？

陈德森：我的童年不是很快乐。我家住在九龙，因为从小不爱读书，常被记大过，成绩单也不够漂亮，回到家怕挨打，就躲去学校旁边的国际戏院看电影。下午放学的那个时间段，票价相对便宜。电影让我快乐忘忧，带着我一次次逃离现实。看完电影，出门买点吃的，一边吃一边想起晚上可能要被大人打，就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我刚刚还开心了一个半小时。倏忽间惊觉，长大后，我是否可以做些令人开心的影像？就是这样，我开启了与导演这个职业的缘分。

问：您念高中时就当了临时演员，又做编剧，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？

陈德森：最早我在丽的电视台电视剧编剧组，全组人一起拼斗，可以为了一个节目的收视率24小时待命，直到创作完成。这些加班都是自发的。我们每个月还会组织一次联谊活动，分享这个月的创作心得。也会办一些搞笑的评选，比如“三最”——最猥琐编剧、最丑陋编剧、最体弱多病编剧。有一次我们颁发了“文采奖”给文隽，因为他把我们所有编剧的名字变成了气质相符的商业

品牌名称，如江龙饭店、丹瑞眼镜、文隽

书局、华桥跌打和立人幼儿园，我的

名字就是德森木材……这种有爱的

创作气氛，真的令人怀念。

问：上世纪70年代末您担任了成龙的助理，是香港第一次出现艺人助理这个职业，本来非常令人羡慕，却仍要“出走”做导演，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？

陈德森：那时候成龙22岁，

我18岁，跟着他的日子天天都吃好喝好，他待我犹如亲弟弟，投资人为了推荐自家剧本更是对我亲近有加。那会儿就一个字，“飘”。但我始终记得自己是来学做导演的。

21岁那年，我吞吞吐吐地对大哥如实相告。大哥没说话，但他的表情好像在说“就凭你”？虽然他有些不快，但还是推荐我到一部戏中去做场记，后来我拍《特务迷城》时，他又主动来我做男主角。

希望继续拍电影 释放更多正能量

与我同期出道的副导演已跻身导演行列了，拍了一部颇为卖座的影片。他当着大伙儿的面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：“你东家做一下，西家做一下，常常漂浮不定，这样下去是很难成功的！我可以帮你一把，如果你认真听取我的指示，我便向公司提出，让你拍一部低成本电影。”他的语气和表情都带着讽刺，又像是等着我求他。但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还未学够，不急着当导演，感谢你的好意。”他喝了两口啤酒，不屑地指着我，大声对在场的人说：“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，这位末代的最后一个副导演——陈德森！”接下来，大家发出既怜悯又带点同情的笑声。那一晚在座的二十多人，如今只剩下三位仍然活跃于电影行业。有时候，在现实生活里听到比较难堪的话，往往会成为我日后电影里的台词。今天重提这件旧事，并不是要借机侮辱任何人，只是感恩我现在小小的成绩，虽然来得比他们晚，却让我更懂得珍惜。

问：1994年的电影《晚9朝5》是您的成名作，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来的？

陈德森：在《晚9朝5》之前，我连续拍了两部有明星助阵的电影，《我老婆唔系人》和《情人知己》，我的焦虑症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我在《把悲伤留给电影》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拍摄这两部电影的曲折过程。那时发生的种种问题让我情绪低落，甚至思考日后是否还要当导演。后来，陈可辛导演拜托我为他执导的新片《晚9朝5》搜集素材。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喜欢在夜店流连、对前途感到迷惘的年轻人的故事。我找到一些这类年轻人，但专访过程中出了问题，陈可辛导演向来滴酒不沾，更没有泡酒吧的习惯，不太懂得该怎么跟这类年轻人交流，弄得现场气氛好像是在招聘面试。我提议大家喝点酒，放松情绪，有些氛围再进入话题。结果，在十多天的访谈里，陈可辛导演一直默默坐在一旁，都是由我和编剧来发问。后来有一天，陈可辛导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我看过了你之前的电影，你说故事有一套，目前最近需要一个了解你强项并帮助你发挥长处的监制！”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他又说：“别想了，我们合作吧！”

问：看似偶然，其实却是因为您具备了得到机会的能力。

陈德森：拍摄过程中陈可辛导演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出名了，就要掌控一切，我有百分之百的主导权。《晚9朝5》最终票房超过1000万港元，被选为当年金像奖“十大华语片”之一。颁奖典礼当日，负责颁奖的林岭东导演看得得意忘形的我，悄悄对我说：“这部电影的爆发性成功只是一个开始，但你已经飘飘然双脚离地了，我的第一部电影也遇到过你现在的情况，所以我想把你从空中拉回地面！”我非常感谢陈可辛导演找我来拍这部电影，也要多谢林岭东导演，他语重心长的提醒，让我重新脚踏实地。

希望继续拍电影 释放更多正能量

问：在您执导的电影中，《童梦奇缘》是非常特别的一部，能否谈谈这部电影的创作经过？

陈德森：因为家庭的缘故和对我父亲的情结，我一直想拍一部反映亲情的电影。那时寰亚电影公司的总经理约我见面，说刘德华与公司有一部电影合约，但迟迟未能找到合适的剧本，希望我准备一些题材，与刘德华见面聊聊。华仔是我一直



很想合作的演员，我便与公司负责人一起到片场探班。趁着剧组放夜宵的时间，我连着向刘德华说了两部动作电影的故事，他听罢无精打采地伸了个懒腰，打着呵欠说：“我拍了超过100部电影，拍过无数动作电影，对动作电影实在有点厌倦，你回去想一想，有没有一些非动作又特别一点的题材？”说完他便起身要走，我突然冒出一句：“我有一个关于父子亲情的奇幻故事，暂时取名叫《童梦》……讲的是我和父亲的矛盾，直到父亲离世后，我才明白‘子欲养而亲不待’的感受。”我和刘德华都静止了十几秒，然后他笑着说：“我们就拍这个电影吧。”后来，我从寰亚电影公司的同事口中得知，那段时间刘德华的父亲得了重病，可他总是太忙而未能经常陪伴父亲。所以当日对我的那一句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特别动容。

问：您觉得《童梦奇缘》最大的成功是什么？

陈德森：记得刘德华知道我们的制作费非常紧张，便自掏腰包加强演员阵容，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都很尊重华仔的原因。这部电影在香港取得了2000万港元票房的好成绩，成为该年度票房排名第二位的香港电影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通过朋友找到我，说他从小便憎恨父亲，仇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后来加重变成狂躁症。他在参加一个助人解决心结的团体课程时，偶然看了《童梦奇缘》，之后开始反思、顿悟、释怀。这件事情让我更加坚定未来的创作方向，就是一定要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。

问：您还想拍哪类电影，展现怎样的正能量？

陈德森：我希望能够拍摄不同类型的电影，比如主旋律影片，根据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真实大事件创作的故事。另外，我感觉现在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哭越来越容易，笑越来越难，所以我想拍喜剧片，希望大家能够真实地笑一笑。虽然我不太懂爱情，但我还是很想拍爱情片。

陈德森自述

分享生命中的悲愁欢喜
做慈善是后半生的目标

能够出版《把悲伤留给电影》这本书，我很感恩，但为什么要取一个悲伤的名字，这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。我有过两段严重的抑郁症，在拍摄现场面对过三次死亡，体会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悲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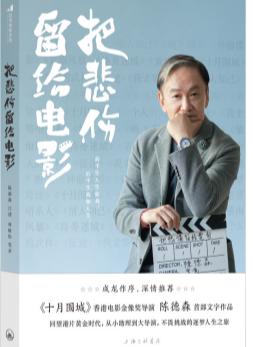
拍《十月围城》，艰难寻资筹备近十年，开机后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走出来的过程有很多故事，我毫无保留地写在了《把悲伤留给电影》里。那时我无法继续工作，回到香港修养。我大姐特地从澳洲赶回来探望我。她非常惶恐，把看到的一切写了下来：“我看到你早晨7点起床，站在阳台看着对面的山坡一言不发，几分钟后返回房间继续昏睡。数小时后，你坐到了餐桌前，菲佣拿着水果、麦片给你吃，而你举起叉子向餐桌叉着，又一下便往嘴里送一下，叉的、吃的都是空气……”

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吃那些抗抑郁的药了。《十月围城》港方剧组的工作人员传短信给我：“如果你决心不回剧组，我们也要决定跟你共同进退。”事情变得更严重了，如果因为我的问题令一部分重要的工作人员撤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几经深思，我回复说：“我已经看医生了，暂且没事，并将于两天内回到剧组，大家都不能走！”

当我知道自己患上了抑郁症，到后来懂得了治愈方法，我有一个顿悟，那就是我发现自己前半生进入电影行业后，生命里便仿佛只有电影，能够成功固然高兴，但如果失败了，我便像是失去了一切，世界末日来临。所以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决定在自己的后半生寻找新的人生目标，让自己轻松和快乐。这个人生目标就是“行善”。

这几年我见过很多抑郁症患者，很多人经历一两件事就会想不开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，我都扛过来了，你也可以扛过来，没问题！我也会努力做慈善筹钱，包括自己在电影上的收入，都会拿出一部分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像这本《把悲伤留给电影》的收入，就是捐给了大凉山一个儿童之家，用来扩建宿舍。

这一年，我除了一些电影作品让大家认同、获得了一些奖项之外，能协助成立“榕光社长者服务中心”及“慈善安老院”应该也是最让我开心的事！展望有生之年，我想在香港建立一所“文化及演艺界慈善养老院”，让年长且无依无靠的演艺界人士居住。我未来所有的作品，必须充满正能量，让观众离开电影院的那一刻，心情是开朗的，且更会相信——明天有希望！



陈德森著

身边好人

关爱西藏少儿教育，“齐兴”助学基金募集捐款超千万元

一次援藏行 一生西藏情

本报记者 郭晓莹

中国照片档案馆存有一张2001年拍摄的汇款单图片，是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收到的第一笔捐款，1118元，署名为“七九年援藏干部”。直到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，这位援藏干部每年都会给指挥部寄来汇款单。多年后，人们终于找到了这位汇款人，他就是中交天津航道局的李纯民。这份心系藏区的深情，源自四十多年前的一次援藏经历。援藏结束返回天津，但他仍心系西藏，发起成立了“齐兴”助学基金，关爱藏区少年儿童教育，募集各方捐款超千万元，其中他个人捐款130万元，获益师生超过5000人，遍及当地15所学校。一次援藏，让他与西藏结缘一生。

发起设立“齐兴”助学基金
资助西藏类乌齐县贫困生



李纯民（中）与藏族孩子们

开西藏，返回原单位。五年的援藏经历牢牢根植在他心里，他将这个遥远的地方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。1993年，李纯民和朋友回到类乌齐县做三农调研。经过一个教学点时，发现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，钉上去的塑料布千疮百孔，风一刮呼呼作响。这让他感到一阵心酸，和朋友给学校留下200元钱安玻璃。回去后他也总觉得惴惴不安，总想为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多做点事。

2006年，担任天津航道局领导的李纯民和三位朋友再次回到类乌齐县。经过恩达教学点时，破旧的教室再一次刺痛了他的心。“当时的办学条件有多差？孩子们没有椅子，就坐在木板甚至树墩子上……”眼前的一幕，让他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。他跟几个朋友商量，自己出资10万元，三位朋友出资25万元，捐出35万元，与类乌齐

县签订协议，为恩达教学点建教室和生活用房，由县里负责施工，并叮嘱一定要保证质量。

转过年来，李纯民又去了一趟类乌齐县，新校舍已经建好，恩达教学点升级为恩达完全小学，办学规模扩大了。他终于欣慰地笑了。但这件事并未就此结束，恩达小学只是李纯民援藏助学的起点，他决定长期助学，发起设立“齐兴”助学基金，希望“类乌齐兴盛，众人齐心振兴教育”。由他作为基金发起人负责筹款，类乌齐县教育局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。

为了筹款，李纯民每年都会“呼朋引伴”进藏，少则四五人，多则十几人，这些朋友都为“齐兴”捐了款。有一次李纯民和老伴儿乘机旅行，和邻座聊起援藏助学的事，那位陌生人当场就要了“齐兴”的账号，很快转来5000元捐款。“援藏助学并非我一个人的力

量，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伸出了热情援手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交通部的老领导黄先耀同志，他给了我很大帮助，多次联系机构、企业为类乌齐县改善办学条件捐款，教育、鼓舞、激励我，尽力做好援藏助学这件事。”李纯民说。

“齐兴”助学基金最初有两个用途，“园丁奖”和“勤学奖”，分别拿出一部分钱，奖励在高海拔、偏远地区工作的老师和家庭困难、成绩优秀的学生。自2012年起，“齐兴”助学基金又组织了“一帮一、结对资助”活动，以每名学生每月400元生活补贴、每年4800元的标准，结对资助类乌齐县的贫困生。目前已开展到第七批，每批资助十几名学生。天津航道局领导钟文炜带领十几名干部，作为资助人参加了结对资助活动。李纯民本人资助了两名学生，其中一人已大学毕业。“从第五批开始，资助人就以天津航道局中层以上干部为主了，现在仍有二十多名学生接受资助。”李纯民说。

解决高海拔学校冬季供暖问题 把旱厕改造为水冲厕

十几年来，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给西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前风雨飘摇的教学点被崭新的教学楼取代，孩子们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。李纯民和“齐兴”助学基金开始想办法满足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，变得更加忙碌：解决类乌齐县高海拔学校冬季供暖、早晚洗漱用热水等问题；推广教学一体机辅助教学；把旱厕改造为水冲厕……新项目一个接一个启动，因资金缺口较大，李纯民又开始“化缘”。

岗位、仁青卡、长毛岭三所小学，所在地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，每年冬季长达6个月，最低气温零下20℃，非

常寒冷，甚至到了初夏，屋檐下还有未融化的积雪。在教室里，孩子们主要靠木材和牛粪生火取暖，条件十分艰苦。李纯民从孙中山基金会、深圳市南山区慈善会募得捐款260万元，投入类乌齐县“齐兴”助学基金项目，为三所小学提供冬季取暖设备，让孩子们能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上课。

伊甸乡小学厕所改造时，李纯民在学校的两个多月，跟校长、设计施工人员一起落实具体保温防冻措施。在海拔最高的小学，他拍下蓝天白云，在朋友圈炫耀“西藏的天空”。他期待藏族孩子们在那离天空更近的地方，离梦想也能更近一点。

这里的校长们遇到难题也会想到李纯民。有的学校水管冻裂了，请他帮助恢复管路供水；有的学校因变压器超负、电压不稳导致设备烧坏，也请他想办法解决。前不久，一位校长找到他，说自从学校实现供暖后，很多牧民都愿意把孩子送来住校，原来有50名学生住校，现在增加到180名，学校腾出一座办公楼当宿舍，可是没有暖气，想请李纯民帮忙。李纯民当仁不让，又开始四处“化缘”想办法，为孩子们奔走的日子让他感到快乐。

让孩子们用上干净卫生的厕所，让偏僻的乡村学校通过教学一体机和广阔的外部世界联结，这是李纯民的梦想。他把对藏族孩子们最真切的关爱融入一盆盆热水、一间间新教室、一台台空调、一部部教学一体机中。那些因李纯民而改善了读书生活条件的孩子们，其实绝大多数都没见过这位好心的“李爷爷”，只是从老师的口中听说过。有一个孩子给李纯民写信抱怨：“听说您走了，我有点儿生气，我从不知道有像您这样的人，可是我还没见过您……”

助高原孩子打开眼界
看升国旗、看大海

农牧区的孩子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，目之所及就是他们见过的全部世界。李纯民想帮孩子们打开眼界，于是发起了一项新活动——让孩子们去天安门看升国旗，到天津看大海，并给这项活动取名为“天天向上”。2014年9月，首期“天天向上”活动启动。李纯民的善举感动了天津航道局的领导和同事们，自2016年起接过了“